

追寻· 追忆· 追思

——文献纪录片《长江支队：从太行到八闽》观感

□汪帆

由我省摄制的4集文献纪录片《长江支队：从太行到八闽》近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再次将观众目光聚焦在革命老区武安。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全国解放已经是时间问题，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在部署渡江战役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迅速从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准备接管长江以南新区政权，建设新中国。从太行、太岳两个解放区选调4000多名干部骨干，在今河北邯郸市下辖的武安市培训整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包括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委的政训班，随军南下，接管福建省地方政权，这是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建设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队伍。文献纪录片《长江支队：从太行到八闽》第一次用纪录片形式表现这一重大革命史实。

追思，为了忘却的纪念。从历史尘埃中考证、发掘、搜集、整理、缝合、复原，几乎成为文献纪录片创作人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将历史难点变为纪录片亮点最有价值的艺术贡献。

南下干部吴彬之子吴建兴，在闲暇之余萌生了“想了解父亲南下足迹”的动意，于是，节目组和吴建兴一起踏上了追寻父亲足迹的征程。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切入，却暗合了一个时代历史的动机。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吴建兴追寻父辈的革命足迹，仅仅为了闲暇之余的思念吗？冷静客观的叙事手法，从吴建兴追向母亲当年和父亲告别时互相说了什么开始。然而母亲却淡然平静地回答：“没什么说的。”作为红二代的吴建兴更加坚定了要去追寻父亲南下足迹的决心。第二集写河北曲周籍干部张振业，21岁时牺牲在南下途中南京市浦口站，作为烈士后代的张好英，从小全然不知道自己身世，直到71岁才决定去追父亲南下的壮举，“走完父亲未走完的路”。第三集写了南下干部雷宏之女雷晋萍和杨柳之子杨卫国，退休后相约踏上追寻父亲南下成为“宁德人”足迹的光辉之旅……由此引出了他们的父辈壮别太行、浴血南下、建政剿匪、建功八闽的史诗功业。

追忆，为了缝合碎片式的史料。追寻前辈足迹的过程中，离不开亲属、当事人、见证人、研究者的追忆。该片采用“朋友”视角，在日常生活状态下，寻访、讲述、回忆，共同追寻历史事件中的细枝末节。通过不同身份的人物讲述，那些支离破碎的史料，被巧妙地缝合在一起，慢慢浮现出完整而鲜活的艺术形象。这一创作手法隐藏在四集篇幅的诸多叙事中，时时释放出这部文献纪录片的审美效应。

在第三集《建政剿匪》中，雷晋萍到父亲战斗过的建瓯县，寻访在征粮中牺牲的年轻干部常全的足迹。常全没有结婚，也无后人，而当地乡亲们看到雷晋萍多次来凭吊祭扫，便反复问她是常全的后人吗？雷晋萍最终在心中默许，她也是常全的后人，因为在她的心中长江支队是一个整体。当事人情感的升华，深深感染着观众。杨卫国的父亲杨柳曾任建瓯县公安局局长。建瓯县曾是国民党师部、中美合作所特训班所在地，在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大量反动军官、残匪特务，他们疯狂威胁、暗杀南下干部。节目组寻找到县公安局一位邢台籍侦察员乔金来的后人，在和她的聊天中带出了一个侦破特务案件的故事。

追思，为了红色丰碑永远不朽。该片第四集重点讲述了三位杰出南下干部的典型故事。第一位是梁东初，通过其女梁新阳的深情讲述，我们知道了这位扛枪打仗、率兵杀敌的军事干部，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专家，为新中国水电建设培养出大批骨干。第二位是放弃南平县委书记职务，自告奋勇去当一个拓荒农场场长的耿联江，他不仅成功地办好了农场，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派去国外执行合作任务，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型领导。第三位是担任过东山县委书记的河南籍南下干部谷文昌，他带领东山军民励精图治、战天斗地，将荒岛变绿洲，留下的新民谚“先敬谷，再敬祖”至今流传。

综观全片，虽说只有四集，但充分展示了南下干部的辉煌业绩，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八闽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更铭刻在党和人民心中。作为一部填补了中国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史、我党组织史关于南下干部研究空白的文献纪录片，它展示了一大批听党话跟党走、忠诚践行初心使命的党员干部英雄群像，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添了一部生动教材。

以“异质性”写作建构青年文学审美范式

□赵振杰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摆脱写作惯性，突破审美瓶颈，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叙事之维，是摆在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种种迹象表明，青年作家目前正在经历着自我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双重觉醒。与“青春文学”分道扬镳，完成“自发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型的成人礼，基本构成了现阶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声。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更加渴望通过文字呈现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自我。于是，“自我”成为当代青年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尝试去触摸和理解世界、历史和人生，尝试去思考 and 阐释个体与他者、存在与虚无、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艺术辩证法。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显著特征就是“小”，换句话说讲，“自我”几乎成为青年作家“自我”展现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我”构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观的话，那么“小”俨然就是他们的创作方法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属于“技术流”还是“内容派”，是笃信“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拥趸，还是秉持“写给永远的少数派”理念的先锋主义信徒，抑或是践行“文学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接班人，都力图在作品中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和个性化气质。

理论上讲，青年作家对于“自我”的反复找寻与确认，以及对个

性化写作的极端推崇与强调，应当催生出一个更为斑斓、多元的文学生态。然而，整个当代文学格局并未因他们的介入，而出现本质性的裂变，反而在表面的丰富多样中隐隐显露出一种更为同质化、单向度的创作趋势。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写作经验不足，生活阅历有限，艺术技巧有待打磨，思考深度需要加强，等等。然而，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作家要想突破写作困局，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风格，前提条件是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既定文学场域与审美范式有一个清醒的审视与反思。

皮埃尔·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是在一定场域中多方活跃的资本力量相互角力竞争的结果。当下青年作家所面临的文化语境是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价值力量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此消彼长，配置重组后，基本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和平期”。在主流文化熏陶下，青年作家树立起契合时代精神的人生观、价值观；“后先锋时代”的文化语境建构了他们“后精英化”的思维认知模式；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则直接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搁置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不谈，仅就精英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多数青年作家均接受过系统化的大学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和背景。而当前大学里最红最火的教授、学者无不参与或见证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有些甚至就是凭借“重写文学史”，组织策划“人文精神大讨论”，译介西方（后）现代主

义文论著作，阐释、解读“先锋派”作家作品而在学术、理论、批评界扬名立万。在这种思想氛围的教化、熏染下，青年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谓“文学性”“审美性”“纯粹性”“艺术性”浓郁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家，以及那些被“重写文学史”打捞上来的作家情有独钟。

为了更好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不妨从去年《中华文学选刊》策划的关于35岁以下“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谈起。当问到“哪三位作家曾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时，在这些青年作家列举的名单中，外国作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17名受访者平均每人列举三名作家，其中提到的外国作家名字就有246名，占比高达70%以上，这意味着平均每位受访者名单中会出现2个及以上的外国作家名字。有人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和审美范式，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让作家列书单。一些当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往往更热衷于阅读外国书，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青年必读书》中提到的这种现象，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波助澜，逐渐由“时尚阅读”演变成为当下的一种“生活日常”。对于青年作家而言，“看外国书”似乎就像朋友交谈时口中无意间冒出的英文单词一样自然，毫无违和感。

当然，对此我并不抱有太多成见。作为青年作家中的一员，我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开阔的世界视野、多元的创作技法、前沿的文学理念、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平等的对话交流方式，等等。思想文化的开放、资本市场的繁荣、网络科技的发达让青年作家可以更直接地接触、感知世界文学的生态样貌，可以更充分地吸

收、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对于“先锋”叙事神话的顶礼膜拜，以及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理念的盲目推崇，势必会为当代青年写作带来一系列集体性的认知误区，诸如知识大于经验、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形象、虚构大于真实、前卫大于传统、自我大于一切，等等。而这些价值偏见恰恰正在假以“纯文学”之名建构起新的“楚门的世界”。

有鉴于此，我们更应期待和呼唤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质性”写作。这里的“异质性”既非单向度地指向一种破坏性、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美学观，也并非无条件地等同于“前卫”取代“守成”的文艺进化论，而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去勘探写作的开放性、建设性以及作家自我风格的成熟度。更确切地讲，“异质性”应当被拆分成“异”与“质”两部分：“异”是溢出，是特性，是辨识度，是公共经验的个性化表达；“质”是聚拢，是共识，是诠释力，是个人经验唤起的群体共鸣。诚如李敬泽所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青年写作的“异质性”同样如此，它本质上就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今，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全球化、互联网、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文化形态，正在不断刷新和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这其中必然也孕育着文学范式转型的诸多“异质性”因子。作为新时代的剧中人，我愿与同代人一道，以真正意义上的“异质性”写作来建构一个更具生命力、可能性、多元化的青年文学生态。

讲述抗震故事 传承抗震精神

——评马誉炜《1976，红星在唐山闪耀》

□吕少斌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人员伤亡惨重，大灾考验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考验着人性。马誉炜撰写的《1976，红星在唐山闪耀》（花山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以一名抗震救灾士兵的视角，全景式、多维度地展现了四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经历。作者以悲天悯人的笔触，再现了唐山地震发生、发展、救援、重建的过程，生动诠释了唐山抗震精神中蕴含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的人文精神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作为当年以新战士身份参与抗震救灾的亲历者，作者以在唐山的生死救援为主线，多方搜集素材并

采访当事人，用生动的笔触回答了人们对救援过程的关切。唐山大地震是人类不可抗拒的灾难，房屋损毁，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压在瓦砾之下。灾难达到什么程度？抗震救灾调动了多少部队？救灾过程是怎样的？作者用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部队开进灾区的详细过程，记录了受灾严重的唐山当时的情形，记录了部队到达灾区后，迅速展开的一系列救援活动。

大灾无情人有情。该书的看点在于多角度展示军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灾难发生时，正在唐山驻防的某师电话员高东丽，放弃生的机会，连续向上级发出十多个警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被毁坏的唐山空军机场，指挥调度室主任李升

堂，在机场大部分人员伤亡，与外界中断联络的情况下，从容指挥飞机起飞，向党中央汇报灾情。地处震中的255医院有1300多人，震后仅40余人脱险，政治处干事吴忠民从废墟中爬出后，当即与另外4名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和救灾领导小组，并成立指挥、抢救、医疗工作组，开展救援。在监狱执行看押任务的某营营长栾德楚，顾不上遇险的妻子孩子，带领看押人员果断处理一系列险情，1200多名在押犯人无一逃脱。直到震后第46天，他才在防震棚中见到两个幸存的孩子。这些故事读来让人感慨不已，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民军队一往无前，哪里危险冲向哪里，哪里需要奔向哪里，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时代壮歌。

书中有许多令人垂泪的故事。作为抗震救灾的亲历者，作者没有过多地使用文学创作的技巧，而是以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情感感染人。没有大型救援设备和工具，没有专业救援技术和经验，战士们手扒肩扛，双手磨得鲜血淋漓也全然不顾，救出一个个幸存的生命，挖出一具具罹难者的遗体。灾难是残酷的，但战士们对灾区群众的感情是深厚的。搬运遗体时，军务股参谋姜广绪一再叮嘱战士们轻抬轻放。车装好后，官兵们都要整理军容，庄重地向死者敬上军礼。

该书毫不隐讳地暴露出很多“痛点”。写灾难不是为了揭伤疤、抢镜头、赚眼泪，而在于警示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中国地域辽阔，地质情况复杂，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上大灾不少，如

何引以为戒，吸取教训，值得后人警觉和深思。

该书可贵之处在于展示了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勇敢坚强、团结一心、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这样说过。大地震使唐山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但震后唐山人民创造的大灾无大疫、迅速重建、恢复生产、城市崛起及形成的抗震精神等，都为全人类带来了宝贵财富。

《1976，红星在唐山闪耀》既是作者一次刻骨铭心的心灵感悟和精神回顾，也是当年一名参加抗震救灾的战士，对唐山这座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倾情奉献的一份厚礼，更是一部讴歌唐山抗震精神、激励人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精品之作。

书中寻我

——评刘江滨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

□闻章

好书如镜鉴。刘江滨馈我新书，当晚即展卷。之所以马上读，是想在里头看到我。何谓书里的我？亲切处、会心处、动情处、忘情处、击节处，等等，即是我了。说是我似乎也不对，而是我之向往，是那个企盼的我，完满的我，境界中的我。读书之人，之所以能进步，盖在我之前或我之上有另一个我在引导。

我与江滨有对比：我是个年龄大的，他是个年龄小的；我是个出道晚的，他是个出道早的；他是个读书多的，我是个读书少的；我是个写得好的，他是个写得差的。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即我们都是不得了的了。

《当梨子挂满山崖》（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分五辑，如花五朵。虽是五朵，却也归于一枝，而其背景即是花之树，或者花之海。或人，或事，或情，或境，我边读边感慨，很是觉出了我的无能。比如“世事纷披”和“血脉乡愁”里好多篇什，我也熟稔，却写不出。待他写了，才感觉我也能写，这即是差距。

如《数的事》，由于数学乖拗于己，便格外对数字用心，引经据典，说东说西，从小学走步“一二一”，到陈景润的“1+2”，到老子的“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一直说到云

计算，明示数之重要，须知心中有数才是。我却总愿算盘上帝，不妨独得不识数的好。想了想，世间有糊涂，亦有难得糊涂，他想的是只有不糊涂才能做到难得糊涂，我却一直在糊涂里。

“文岸徜徉”是写文化人的，现当代的及古代的，一共十多位。江滨对于文人情有独钟，我想也是“揽镜”之故。或羨其才，或慕其志，或惜其心，或叹其遇，每每感同身受，古人今人不过是入眼入心之人耳。关于这部分，其实他才开始，只是结集时有几篇算几篇。集子出版期间，又发表了好几篇。也不仅这部分，整个创作的纯粹状态他其实刚开始。之前，他任报社总编，总编就是总在编，闲工夫有如夹在书页里的陈年蠹鱼，捏也捏不起。是在去年，始放骐骥出厩，自此才是他的创作新时代。

我读他的文字，却感知其情性。透过柯灵先生，我知其怀抱；透过张中行先生，我懂其恭谨；透过韩羽先生，我见其洒脱；透过楼肇明先生，我感其崇敬并自省；透过弘一大师，我念其透彻。我这么说只是方便，是想说他在写每一个人时，都是用心在写。别人的高，是自己的仰望；别人的好，是自己的规范；别人的真，是自己的映照；别人的曲折，恰也是自己的借鉴。看似写他人，



其实是写自己，边写边撮拢，形象属人，而意思归他。这意思，恰是最养人的。

说几句题外话，我和江滨都写过韩羽先生，被称为韩羽先生的大秘二秘，当然是戏称。论岁数，我为大；论功底，他为大。江滨写韩羽先生，是层次里的韩羽先生；我写韩羽先生，是浑沦里的韩羽先生。韩羽先生呢，看似在浑沦里，其实在层次里。

最动我心魄者，是江滨写父母的文字。此文由泪浸透，于是我

也禁不住几次潸然。母亲走失，全家乱作一团，电视上播出新闻：一老太太落水被人救起，画面上湿漉漉躺在席子上的老人正是母亲。江滨急忙赶过去，匍匐向前，大喊：“娘！娘！”母亲醒来，摸着江滨的脸，叫一声：“儿啊。”江滨不由号啕大哭。哭醒后，才知是梦，而身子还在颤抖。连我都被骗了。此是思母心切所致。由此我幸慰，年近百岁的老母仍健在。但我也失怙之恻，彻骨彻髓，似天崩殒。他思他父，我思我父；他想他娘，我想我娘。

特别是读过《白月亮》后，散步回来，突然书中情景复现，有巨大的仪式感、神秘感和神圣感。想天地间，所有的形而下其实也是形而上的体现。是江滨写母亲的丧仪，正月十五晴空那一轮月，及白月下灵棚内外孝子的“一身素缟”，太阳与月亮，已在对应中。而此时一只蝴蝶翩然而至，不该有蝴蝶之时却恰有蝴蝶，即在棺旁，即在人前，且落在桌面上，不能语，却也已经告诉。最后飞走，融于月色。江滨悟知慈母羽化，遂心生庄严。最后想到母亲的名字：月景。月景盛大者此，福德浩然，似天加被，而实是人心所感。

为人子者，也为人父，世相由此而有。一人一世界，对父母的态度，即是对世界的态度，看一个人好坏，

无须揣摩，看其对父母态度即可。

读江滨，多出来的是我愧我秽。观其行文有“三多”：引号多，书名号多，括号多。为什么？标明出处，此乃学问深湛之故也。那天我俩闲话，说到读《红楼梦》，读与不读该不一样。说钱锺书与赵树理，不可比却也能比。其实说到深处，我便有几分羞。我即是那个捉襟见肘的，先天不足而后天失教，虽奋起直追，也难望人项背。“嗟乎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有江滨就好了。他是另一个我，他写好文章，我来享用，此福也是修来的。

到此该说开头那句“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即我们都是不得了的了”。有人会说，竟说自己不得了，还知耻否？恰是知才这样说。因为我起点低，别说当作家，即能写篇成句的文章，即已经是奇迹。我的不得了即是指这个。我能半羞半臊中傻呵呵地活着，靠的就是“不得了”理念。而江滨的不得了，也不是说他已经多么不得了，而是他具备着不得了的各种基因，学问、生活、境遇等，因缘俱足，他已然在努力中，我想，他若是能努力做到不努力，进一步放松了自己，即有可能进入为文之化境，那时之不得了才是真不得了。

我早已不得了，他即将不得了。我俩的不得了，不是一个，他得他那个，我得我这个。